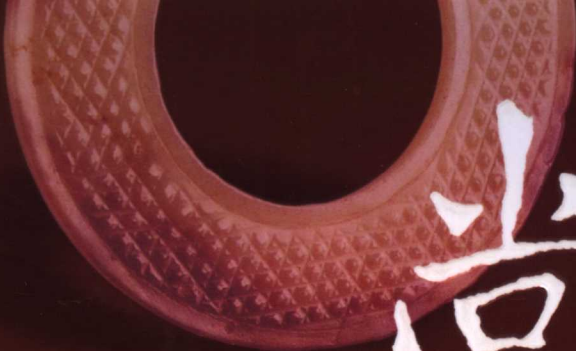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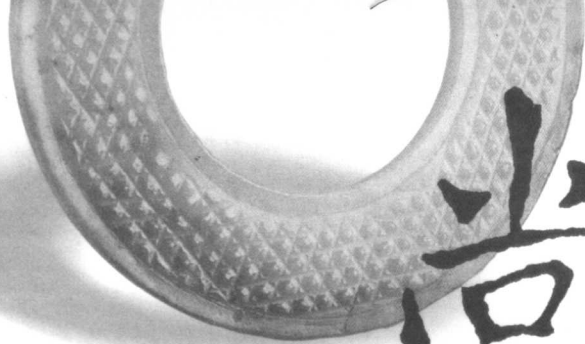


尚書

今古文全璧

郭仁成 著

岳麓書社



尚書

今古文全璧

郭仁成 著

岳麓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尚书今古文全璧/郭仁成著. —长沙:

岳麓书社, 2005

ISBN 7-80665-704-5

I. 尚... II. 郭... III. ①中国—古代史—商周时

代②尚书—译文③尚书—注释 IV. K221.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8616 号

尚书今古文全璧

作 者: 郭仁成

责任编辑: 曾德明 张卫国

封面设计: 胡 颖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 0731—8885616 (邮购)

邮编: 410006

网址: www.yueluhistory.com

200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印张: 13.375

字数: 275 千字

印数: 1—3,000

ISBN 7-80665-704-5/K · 243

定价: 28.00 元

承印: 长沙化勘印务有限公司

地址: 长沙市青园路 4 号

邮编: 410004 电话: 0731—5583670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



郭仁成

(1923-2002 年)
史学工作者，
1923 年 9 月出
生于邵阳一农家。

少时在乡间求学，因成绩优异，1945 年保送湖南大学经济系，1949 年毕业。解放前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任湖大党总支委员、湖南省工委委员，并主编《湖大新闻》。解放后首任《湖南青年报》副总编辑。五十年代遭受不公正待遇。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任教员。1980 年平反昭雪后调湖南省社会科学院。先后任古近代史研究室副主任、副院长级研究人员。并当选为省史学会、楚史研究会常务理事，古代史研究会副会长。

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：《楚国经济史新论》、《老子新解》、《岳麓风云》（与何长胜、邹乃山合作）、《论岳麓书院的爱国主义传统》、《胡庶华传》；参与编撰的大型著作已出版的有：《湖南省志·人物志》、《湖南历史人物词典》、《魏源全集》；完稿的专著有：《刘蜕集校译》、《评西汉四儒》、《雷震百年——重读严复〈辟韩〉》、《魏源〈老子本义〉的现代启示》等。

《尚书今古文全璧》序

现在书的产量颇高。听说一个什么人,他在短短十几年里,写了二三十本书。对这种事情,我总持保留态度。他短时间能写出这么多书,说明他相当勤奋,或者还有秘书或是研究生帮忙。即算如此,对于书的质量,我还是有点不放心。这种时候,我承认我有疑心,不知道对也不对。这么快速高效,或者是为了出名,或者是为了挣钱,或者是为了固位,或者兼而有之吧。或者他是天才,他是文豪,那就别无他法,只有佩服了。

我曾经在一个学校里做过一点管理方面的事情,提出在若干年内,要争取达到一百名教授,可过不了几年,就超标了,现在已是三四百名教授了。谁知事情发展会有这么快。不得不自己承认保守落后。教授数量大发展,可不是说评就能评的,得有家伙看,要有书,要有文章。于是就产生了印之不竭的广大的书源。一群等着当教授的人,捧着自己心血换来的科研成果,又拿血汗换来的钱去取得一叠带书号的印刷品。这想必不是什么秘密了。这样的书,说句实在话,也看不那么稀奇了。

倒是有一种书,到了我的手里,我会感到特别珍惜。那就

是这类书的出版,不为名,不为利,与固位没有关系,更不是想当教授,而是作者的遗属,他的后人,为了纪念已故的亲人或先辈,为了他们对社会和家庭的贡献,为了他们生前的坎坷存有未伸的壮志,而辛苦经营,从并不丰裕的私囊里掏钱出版的。我们由此看到了浓浓的亲情,拳拳的孝心。这样的书,在我们湖南,当首推浏阳刘善泽《三礼注汉制疏证》,此书援引赅博,考证缜密。此类有益学术的事,当今似乎已无人能为。再有宁乡廖海廷《转语》,长沙易祖洛《易祖洛文集》。廖先生精于语言文字训诂之学,易先生于楚文化有独到的研究,尤长于诗词联语和骈文的写作。赖有此二书的出版,保存了湖南所特有的一份文化遗产。

现在我案头又有了一本这样的即将出版的书,叫做《尚书今古文全璧》,作者郭仁成先生。如果他还在世,今年才 82 岁。于郭先生我素未谋面。他在湖南大学的同学,我的一位素所尊重的同事,他告诉我有这么一位学者,有这么一本书,叫我在书前缀上数语。情不得却,勉为其难,粗略地说说我读后的感言如下。

书的主要部分是今古文《尚书》的译注。这部中国最古老的传世文献,所谓“佶屈聱牙”,难以通读,现在郭先生把它译成今语,流畅通达,仿佛是现在普通人在相对而语。下面随意选取一段,以见一斑:

原文:帝曰:“来,禹! 汝亦昌言。”禹拜曰:“都! 帝,予何言? 予思日孜孜。”皋陶曰:“吁! 如何?”禹曰:“洪水滔天,浩浩怀山襄陵,下民昏垫……”皋陶曰:“俞,师汝昌言。”

郭译:帝舜说:“来,禹! 也讲一讲你的好意见。”禹拜辞

道：“嗨，帝！我有什么好讲的！我只晓得天天孜孜不怠，努力做事。”皋陶诧异道：“咦，这话怎么讲？”禹道：“当年我奉命治水，但见洪水滔天，浩浩荡荡，包山上岭，天下的民众被弄得昏头转向，眼看都要淹没到大水里去了……”皋陶赞叹道：“这番话讲得好，我们都该向你学习啊！”

这些看似平常的译文，体现了译注者上乘的语言修养，精深的历史研究和敏锐的审察能力。古往今来，注《尚书》者数十上百家，能至如是化境者几希！

《尚书今古文全璧》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篇长达 44 页的单篇文献学论文《论晚书二十五篇仍不可废》。粗看一下题目，以为是老生常谈。可仔细一读内容，才发现所论极其精彩。大旨是说，不得以所谓的真伪论书的价值。说 25 篇是伪，那 28 篇又何尝都是真？晚出的《书》，包含了许许多多极有价值的东西，如“临下以简，御众以宽；罚弗及嗣，赏延于世；宥过无大，刑故无小；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；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”，“有其善，丧厥善，矜其能，丧厥能”，“惟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”，“学于古训乃有获”，“树德务滋，除恶务本”，“制治于未乱，保邦于未危”等。这些都是中华民族长期积累起来的智慧的结晶，何可废也？孟子曾说过以至仁伐至不仁，何至于“血流漂杵”？以为武王仁义之师，所至必望风归顺，把古代的革故，看得非常之祥和。而晚《书》《武成》篇“血流漂杵”之说，仍赫然在目。以现今的视点看，孟轲近于迂，晚《书》才近于真。25 篇实为古时期《尚书》的辑佚，为新时期六朝南学所集体建构。《论晚书二十五篇仍不可废》是历史学家才可以写得出来的文献学伟论，它将久传于世。

《尚书今古文全璧》的另一个组成部分，是一组考据论文。一是考史，一是考释字词。其中以“绝地天通”的解释最为引人入胜。其考史也，欲以彰显楚人文化之权重；其考释字词则以通情达理为准则，不为异常之论。例如，作者不赞同反训说，以为“乱”就是“乱”，不可训“治”，“予有乱臣十人”，是武王说，他有对纣造反的得力臣工十人。此说犹有可商。有反训词是世界上许多语言的通例，不限于古代汉语。例如英语：

I dusted the mantelpiece.(我打扫壁炉架上的灰尘。)

I dusted the cake with sugar.(我给糕点撒上糖。)

同一个 dust 可以有掸去的意思，又可以有撒上的意思。最有名的言论，莫过于黑格尔了，他说：“扬弃（德语词 Aufheben，汉语音译“奥伏赫变”——引者注）在语言中有双重意义，它既意谓保存、保持，又意谓停止、终结……一种语言竟可以将同一个字用于两种相反规定，是很可以注目的事。语言中可以找到自身就有思辨意义的字眼，这对思辨是很愉快的。”（黑格尔《逻辑学》上卷 98 页，杨一之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0）

郭先生学识很广，但每个人都有其不到之处。他不研究普通语言学，对于反训持怀疑态度，是可以理解的。况且反训问题仍在学术界讨论之中，与郭先生持相同看法的有的是，未必他的意见就一定不妥。

我评价作品，私下里有个标准，就是看作者是不是下过功夫。郭先生的书，看得出来是很花了力气的。他那篇《论晚书二十五篇仍不可废》，如果郭先生面授了他的观点，要我来搜集材料写出文章，没有一年是拿不下的。那 50 多篇《尚书》

本文,要把它吃透,要注解得当,要从几千几百条古注中筛选出合适的注文为我所用,要用当今恰当的语言翻译成可读的白话,谈何容易。我自己有这个体验,有时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句子,把文言转成白话,真是搜索枯肠,不胜其苦。可以想见,郭先生写书,孤灯寒夜,溽暑炎天,夜以继日,孜孜以求,才得有此佳作问世。所以我要说,郭先生此书是一本下过苦功的好书。

李维琦 2005年9月1日



论晚《书》二十五篇仍不可废

引 子

本书题名《尚书今古文全璧》，是因为它全收五十八篇，内容包括论证、注释、今译三方面，跟传统的旧《尚书》版本比，注入了最新研究的成果；跟当代只收今文二十八篇的《尚书》版本比，弥补了读者普遍感到的美中不足，使今人读古书，可以原原本本，了然于其全貌。

《尚书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，但它存在的问题也最多，以至于迄今还没有人理清其来龙去脉，更谈不上去评估其史料价值了。历来的经学家比较相信的大致是如下一些记载：①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《书》之所起远矣，至孔子纂焉，上断于尧，下讫于秦，凡百篇而为之序，言其作意。”以此相信，先秦时代《尚书》已由孔子编成。②《史记·儒林传》：“伏生者，济南人也，故为秦博士。孝文帝时，欲求能治《尚书》者，天下无有，乃闻伏生能治，欲召之。是时伏生年九十餘，老不能行，于是乃诏太常，使掌故朝错往受之。秦时焚书，伏生壁藏之。其后兵大起，流亡。汉定，伏生求其书，亡数十篇，独得二十九篇（盖连后得《泰誓》而言）。”这就是西汉立于学官，后世通称为今文《尚书》的二十八篇。③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古文《尚书》

者,出孔子壁中。武帝末,鲁共王坏孔子宅,欲以广其宫,而得古文《尚书》及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,凡数十篇,皆古字也。……孔安国者,孔子后也,悉得其书,以考二十九篇,得多十六篇,安国献之。”一般认为,这十六篇后来一直藏在秘府,并未流传。东汉古文《尚书》勃兴时,马融、郑玄所传授的仍是与今文篇目相同而文字小异的二十八篇。④唐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:“江左中兴,(晋)元帝时,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传古文《尚书》。”又云:“永嘉丧乱,众家之《书》并灭亡,而古文孔传始兴,置博士,郑氏亦置博士一人。近唯崇古文,马、郑、王(肃)注遂废,今以孔氏为正。”接着,孔颖达又为之作正义,由唐皇朝颁行天下,进一步巩固了它的正统地位,成为封建统治者最主要的政治教科书,前后达一千四百多年。

清乾隆十年,阎若璩著《尚书古文疏证》正式刊行。书中列举一百二十八条(缺三十条)证据,证明千余年来学术界公认为先秦《尚书》真本的东晋梅赜所献孔传古文《尚书》是伪托的,不但传和序都不是汉孔安国所作,全书五十八篇经文中二十五篇也出于伪撰。此后,又经乾嘉学派惠栋、程廷祚、段玉裁等的进一步考订,阎氏的结论遂为多数学者所接受。当阎氏写到他的第九十九条证据时,不觉踌躇满志地说:“古文《书》二十五篇,出于魏晋,立于元帝,至今日而运已极。中间为桓谭、张衡之非(讖纬)者不少,安知后不更有欧阳(修)氏出,请以删讖纬者删此古文,尊(孔颖达)正义者尊伏生三十一篇(盖依郑玄东汉古文家说分二十九篇为三十四,再减去秦誓三篇),俾其孤行乎?亦《书》之运也,吾终望之维持此运者。”显然,阎氏辨伪的目的就是要复两汉孤行伏生二

十八篇之旧,废除新增的二十五篇。而他的追随者也的确不负所望,在他身后,正如龚自珍所描述的:“阎氏所廓清,已伸于海内,江左束发子弟,皆知助阎氏;言官、学臣则议上言于朝,重写二十八篇于学官,颁赐天下,考官命题,学童讽书,伪书不得与。”(《庄存与神道碑铭》)谁知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,一位一向“传山右阎氏之绪学”、“惩晋代之作僭与伪”的今文经学家庄存与,却以帝师之尊上言朝廷:“《大禹谟》废,‘人心’‘道心’之旨,‘杀不辜宁失不经’之诫亡矣;《太甲》废,‘俭德永图’之训坠矣;《仲虺之诰》废,‘谓人莫己若’之诫亡矣;《说命》废,‘股肱良臣’启沃之谊丧矣;《旅獒》废,‘不宝异物贱用物’之诫亡矣;《冏命》废,‘左右前后皆正人’之美失矣。”结果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,“而古文竟获仍学官不废”(同上)。

当然,这次争论远远不是问题的解决,而只是问题的提出。事实上,从清末到如今,晚《书》存废的争论时起时伏,始终没有形成多数人接受的共识。值得注意的是,近半个世纪以来,由于传统思想和多种外来思潮的互相消长,扞格更趋激化,以致古史研究特别是《尚书》的研究,反而相对沉寂。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《尚书》专著屈指可数,而作为古籍整理成果兼有普及读物性质的几部,包括杨筠如《尚书核诂》、曾运乾《尚书正读》、周秉钧《尚书易解》、王世舜《尚书译注》,再加上台湾出版的屈万里《尚书今注今译》,却明显地呈一边倒的倾斜:一律只收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,排除了晚出的二十五篇。这种不谋而合的倾斜并非科学论证后的理性抉择,而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急就病,它对今后的《尚书》研究势必形成错误的导向,实在令人担忧。这,就是本书之所以作的缘由,

也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。

什么是科学的真伪观？

晚《书》二十五篇之所以有存废问题，首先是因为它有真伪问题；而要彻底解决它的真伪问题，就必须树立一个摆脱传统束缚的科学真伪观。然则，什么是科学的真伪观呢？简单言之，就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方法，加上兼容兼听的学术民主意识；分析言之，至少要坚持以下三条原则：

①一事不明，不下结论。古书辨伪类于断狱而又难于断狱，因为它死无对证。比如说，阎氏判东晋古文《尚书》为伪，只是凭一面之辞作的缺席裁判。如果被告有机会辩护，肯定会反过来把阎氏指控他的“剽窃”作为正常的“被引用”，来证明他的书是先群书而存在的真古书。诸如此类的辩护和反驳之词还很多，毛奇龄《古文尚书冤词》不过涉及了一小部分，而阎氏和他的后继者都还没有一一加以澄清，这不能不说是本案不明的一事。再比如说，判案的基础必须是主名和作案过程清楚，而本案作伪者的主名始终不知，作伪过程也远未查明，因此，疑点很多，争论尚在持续之中，最近行世的陈梦家《尚书通论》和蒋善国《尚书综述》，还先后重提“后人传误”说以与“伪托”说相抗衡。此说导源于清人冯登府，他在《十三经诂答问》中说：“东晋别有一孔安国，亦通经学，与梅賾上书元帝时相先后，《书传》或出其手，而后人误以为汉之临淮也。”陈书推衍说：“东晋晚叶，会稽孔安国侍中推造古文《尚书》二十五篇，又作《尚书序》，又为今古文五十八篇及《书序》”

作传注。此书似奉晋武帝诏而作，主旨在缀集古义，而作者以今推古，于传注之外增益古文。”又说：“陆德明、孔颖达和《隋书》作者把西汉孔安国的古文《尚书》和东晋孔安国的古文《尚书》混而为一，故以梅賾所奏上的古文《尚书》即孔传本。自侍中安国作古文《尚书》至隋初，将近二百年，而北人初习南学，不甚能分别两个孔安国的时代，遂有这种错误。”蒋书也“疑是后人因孔姓传误”，但此孔姓人应为注《逸周书》的孔晁。蒋氏指出“古文《尚书》在西晋考绎《汲冢竹书》时，大约经过一番整理”，“补正汉代孔壁经文，校勘《三字石经》，收集其他逸书，整理出来二十五篇古文《尚书》经文，合在今文经二十九篇里面。”所以他推测：“孔传经文，特别是晚《书》二十五篇经文，大部分就是根据荀勖等所整理的，小部分由孔晁旁参其它逸《书》，编成一部新的《书》传。”但他强调：“孔晁以注《周书》进而传注古文《尚书》，似本无意作伪”，“并未伪托于孔安国”，他认为后世所以把孔晁作《古文尚书传》误当作《孔安国古文尚书传》，完全是由于“孔晁与汉孔安国都是孔裔，都是博士，所治都是古文《尚书》，且在上的都是武帝；晋孔晁作《书》传事很与汉孔安国事相类，容易致误”（以上引文均见《尚书综述》357—361页）。到底陈、蒋之说站不站得住脚？现在谁也说不准。这，同样也不能不说是本案不明的又一事。事实上，本案不明的岂止这两事！今天下结论还嫌过早，更不用说阎氏那个时候了。既然还不能下结论，又怎么可以先定伪名？所以两百多年来大部分学者习用的《伪孔安国传古文尚书》、《伪古文尚书》、《伪孔传本》、《伪孔》等名称都是不科学的，应予推倒，一律改用另一部分学者习用的《晚出古文尚

书》、《东晋古文尚书》、晚《书》等,才算名副其实。

②今人不该跟古人一鼻孔出气。历史上的真伪问题,总是与政治斗争和学派争论相联系的,目的无非是争“正统”。新朝推翻旧朝,遂称旧朝为伪;待到更新一朝起,则前之新朝变为旧朝,又被贬为伪。如此反复循环,伪人者亦被人伪,自今人视之,便是朝朝皆伪了。《尚书》的真伪何尝不类于此?都是今古文之争、汉宋学之争的产物:甲派得势,则斥乙派之书为伪;丙派得势,又斥乙派之书为伪。好比螳螂捕蝉,不知黄雀在后,到头来势必出现书书皆伪的结局。叶德辉《与戴宣翘书》云:“有汉学之攘宋,必有西汉之攘东汉。吾恐异日必更有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者矣!”叶氏担心的趋势其实倒是一种必然的客观规律,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。自从阎若璩和乾嘉学派开《尚书》辨伪之风以后,汉学攘宋已获巨大胜利,东晋晚《书》的正统地位已经崩溃。而随着以龚(自珍)魏(源)为主将的今文学派的特起,西汉攘东汉的势头更加锐不可当,当年乾嘉诸公奉为正宗以压倒东晋晚《书》的东汉马、郑古文《尚书》,不料也被指为伪书。魏源在《书古微自序》中说:“国朝诸儒知攻东晋晚出古文之伪,遂以马、郑本为真……不知马牛冰炭之不可入”;他尖锐地批评东汉古文《尚书》“实先东晋梅传而作伪”。到了康有为的时候,更著《新学伪经考》,认定孔子壁中诸经全是刘歆所伪造;又著《孔子改制考》,其中有《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》一篇,指出汉代所传今文《尚书》诸篇,全是孔子托古改制所编造的。他比他的前辈龚、魏走得更远了,不但“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”,而且坦然承认今文《尚书》也是伪书,孔子就是最早的作伪者。历史

再往前,到了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兴起的时代,“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”也为学术界所注目。这种骇世惊俗的新说宣称,要“拿了战国以前的材料来打破战国之学”,“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文籍,也可说是想用了文籍考订学的工具冲进圣道王功的秘密宝库里去”(《古史辨》第一册自序)。他们继承传统辨伪的成果,重提《尚书》的公案,对今文二十八篇一一进行疑辨,并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,揭露出儒家编造《尚书》的要害是“倒乱千秋式的拉拢,思想进化程序的违背”。顾氏首批断言《尧典》、《皋陶谟》、《禹贡》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,前两篇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结晶而把它史事化,后一篇则是战国走向统一前夕对实际的政治地理所作的理想规划。同时还提出《甘誓》、《汤誓》、《高宗彤日》、《西伯戡黎》、《微子》、《牧誓》、《金縢》、《无逸》、《君奭》、《立政》、《顾命》、《洪范》等十二篇都不似古文,或为后世伪作,或为史官追记,或是真古文经过翻译,决是东周间的作品。只有《盘庚》等十三篇,他认为“在思想上,在文字上,都可以信为真”(《古史辨》第一册给胡适的信)。但是,别的学者对这十三篇却也不断提出了疑辨,比如何定生就指出《康诰》、《梓材》、《召诰》、《洛诰》、《吕刑》、《多士》、《多方》、《费誓》都不是当时的记录,而是东周时候的作品(《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》)。甚至对人们一向最相信的《盘庚》,也断为伪作:李泰棻《盘庚正伪》指为西周宋人所作,陈梦家《尚书通论》则列为“战国时代拟作”。至于《文侯之命》和《秦誓》两篇也存在问题:蒋善国《尚书综述》指出“文侯和文公均有命词”,而“《文公之命》有三篇”,“秦季儒家整编《尚书》的时候,删掉了《文

侯之命》，用第二次《文公之命》来顶名《文侯之命》”。结局是“《文侯之命》篇名存而词亡，《文公之命》篇名亡而词存”（261页）。陈梦家《尚书通论》则以伏生所传今文《尚书》二十八篇都是秦博士所更定的官本，已经“掺入了秦并天下以后的制度”，并特别点出：“伏生传本以《秦誓》为最后一篇，也透露了一点消息。”其意盖疑《秦誓》殆为秦人所阑入，目的在表明秦并六国是继承周的正统。最后只剩下一篇《大诰》，一般定为西周所作，但诰文中多次出现“尹氏”官名，仍有人疑“乃宗周中叶后所附加”，从而疑此篇为西周后半期之作品，也不是原始的记录。

总而言之，经过二百四十多年的辨伪，《尚书》这部儒家的神圣经典的真面目已经初步显现，如果按古来辨伪家的标准衡量，那就是篇篇皆伪，没有一篇是真的。这个结局不是古文家所期望的，也不是今文家所期望的；不是宋学家所期望的，也不是汉学家所期望的；甚至还出于古史辨派的预料。因为传统的辨伪总是囿于门户之见，他们心目中的真伪常常以“我”为标准的。但是，从宏观上考察，这个结局是明摆着，无法回避的。作为现代人，我们当然不能跟古人和前辈们一鼻孔出气，老是纠缠于传统的学派之争，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抛弃传统的真伪标准：传统的所谓伪《尚书》，是相对于人们心目中早已存在的真《尚书》而言的，现在既然压根儿没有过什么真《尚书》，也就无所谓伪《尚书》了，也就用不着再去为各种《尚书》版本和篇目贴什么“真”“伪”的标签了。摆在现代人面前的任务主要在于：用历史学家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去鉴定和整理现已发现的五十八篇《尚书》，尽可能地找出它们